

改進中文教學管見

常宗豪

近年來，香港文化界、教育界、輿論界，以至在一般市民中，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重視和關切中文教學的問題。這是令人欣慰和鼓舞的。

大量的事實證明，香港的中文教學存在着一系列十分嚴重的問題，亟待改進。兩個月前，中大中文系在四間大專院校所進行的“中國語文基本知識”一年級新生抽樣調查的結果，使我們對解決這個問題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認識得更加深刻了。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改進中文教學，絕非一朝一夕或三年兩載即可奏效；但是，一味因循、延宕，不徹底地檢討目前中文教學的種種弊端，並針對這些弊端從根本上採取有效的措施，中文教學就永無改進之日，數以千萬計的青少年的中文水準也永無提高之望。長此以往，將會產生怎樣嚴重的後果，是大家不難想像的。

新教學觀念的流弊

一種理論或觀念，對實際工作的指導和界定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正確的理論或觀念是如此，錯誤的、不恰當的理論或觀念亦復如是。

就香港的中文教育來說，多年來就是在一種似是而非的“工具論”的教學觀念的引導下，使中文教學越來越背離正確的軌道。誠然，語言是人們進行社會交際和交流思想的工具。中文教學不但絕不可忽視語言因素，而且應該努力使學生掌握語言這一工具。但是，由此就把中文教學的目的，局限在教語言、掌握語言工具，甚至等而下之，只是讓學生掌握“應付日常生活所需”的語言，無疑是嚴重地曲解了中文教學的根本性質和任務，從而把中文教學導入歧途。

道理十分簡單。學生從教材中所接觸到的，不只是孤立的字詞語句，而是包含一定思想內容的整篇文章。當然，不借助字詞語句，就無從理解文章的思想內容；但是，掌握字詞語句這些語言工具的最終目的，不是別的，正是為了使學生更深刻地理解文章的思想內容，並從中受到感染和陶冶，進而明辨是非、區分善惡、鑑別美醜，在潛移默化之中，影響學生的思想情操和道德面貌。

“工具論”這種教學觀念，不僅在理論上不能準確地反映中文教學的性質和任務，而

且在教學實踐上也導致種種流弊。如：

1. 側重詞語、句式教學，忽略作文教學。

詞語教學和句式教學，對小學低年級的學生來說，無疑是必要的，即使在小學高年級及初中，也應該指導學生寫比較複雜的複句。但把這種訓練一直延展到中學五年級，而遲遲不培養學生佈局謀篇的寫作能力，顯然是本末倒置。

因為，就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來說，詞語和句式教學，只能解決運用概念作出準確判斷的問題，這是思維活動的初級形式。作文，則是在運用概念作出判斷之後，進行由簡單到複雜的推理過程，這是思維活動的高級形式。一般來說，一個從小聽母語、說母語的八九歲學生，口頭表達能力已超越了運用概念作出判斷的階段，具備了一些或簡或繁的推理思維的能力。面對這樣的教學對象，我們的中文教學不是循循誘導，而是百般限制他們的思維活動，其結果，勢必妨害了學生的思維能力的發展。

其次，就培養學生的閱讀和寫作能力來說，詞語、句式，只是構成文章的材料，或者說是讀文章、寫文章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孤立地理解和掌握了某些個別詞語和句式，並不等於能讀懂文章、寫通文章。我們知道，一篇文章不只是衆多句式在數量上的機械式的組合，而是在特定的中心思想的指導下，按照一定的思維規律和表達技巧，所組成的和諧、有機的整體。

2. 由於實用觀念作祟，致使作文內容多局限於日常衣食住行的小問題，而忽略重大的社會問題。

對開始練習作文的小學生來說，由於知識、閱歷和寫作能力所限，寫些日常生活中較熟悉、較常見的題材或應用文字，自是必要和應該的。然而到了小學高年級和初中，還是讓學生的注意力集中在生活瑣屑上面，而不引導學生對生活中和社會上的重大問題進行觀察、分析和評論，這樣，不僅使學生日益脫離社會生活實際，還會導致學生思想意識的蛻變。我們不主張把語文課看成是道德教育課，却認為它在形成或改變學生的人生觀和道德觀上有積極作用。而這種積極作用，在作文教學中體現的至為明顯。近年來，中小學生的思想意識和道德面貌每下愈沉，固然有多方面的社會原因。但是，如果語文教師通過作文課，不僅指導學生寫作，還以更多的精力引導學生關注社會上的重大問題，進而使學生能逐步地識別社會現象中的真與假、善與惡、美與醜、是與非，那麼，學生的精神狀態，總不至於像現在這樣令人憂慮。最低限度，也可以在一定範圍內或一定程度上削弱來自社會的不良影響。

3. 上述的片面的“工具論”和狹隘的實用觀念之所以長時期不能清除，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公開考試對中文教學的深遠影響。大家還記得，以前升中試，第一要考成語，於是小學五、六年級就大教成語；第二，因會考人數之劇增，為劃一閱卷員之標準，而以限定條件的方式作文，致使學生只能在限定的框框裏，作堆砌詞匯的遊戲。再以最近初中評核試中的中文科測驗卷樣本來看，第一部分的“閱讀理解”和“語文運用”兩項，仍然跳不出在以吃喝為題材的短文或文章片斷中作分辨和選擇的窠臼。第二部分的“簡

短寫作題”，除了改頭換面地解詞語、變句式外，就是寫簡單的應用文。雖然教育署聲明“本測驗卷樣本僅為示例性質”，但上行下效，這個“示例”不可能不被學校當局和廣大教師視作法定的考試典範。

4. 關於“提問式”教學法。

採用提問的方式進行教學，能使學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過去絕對被動的狀態。在這個意義上說，較之注入式為好。但面對思想已逐漸成熟、思維能力逐漸提高的中學生，還是讓他們在概念（詞）內涵的正誤上兜圈子；或者，從人為的對一個判斷（句）所製造的多種不同的理解中，去選定其中一個答案。由這些枯燥無味、甚至撲朔迷離的教學內容所產生的那種簡單省事的“問答式”教學，和以推動學生充分展開積極思維活動的啟發式教學是大相逕庭的。習而久之，只會使學生的思維能力因受限制而變得機械和僵化。就實際教學效果來說，不一定就比演講式好。

5. 關於背誦的問題。

背誦，在中文科教學裏一直是個有爭議的問題。在五十年代初期或以前，香港的小學中文科課本選的文章都是文言文，有些學校還加教論語、孟子、唐詩三百首、古文評注等教材，而且，都要學生熟讀成誦，才算得完成整個教學工作。在這種訓練之下，那時五、六年級的小學生居然已經能寫出一篇通順的文言文了。反觀今天的中學畢業生，寫篇簡單的應用文字也錯別字連篇，這就難怪社會人士慨嘆於中文水準之低落了。如果我們能反省一下為甚麼以前那種被認為“落伍”的教學反而比今天“先進”的教學來得更有效果？問題便容易解決了。

我以為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認識漢字的本質。漢字基本上是意符文字，而學習意符文字的方法顯然與拼音文字有很大的差異。拼音文字可以憑語音拼寫成文字，意符文字却必須加強記憶訓練才能學得好、記得牢。這在學習的初期可能比較難，可是下了四、五年的苦功後，也就變成一種牢固的知識了。學習漢字如此，學漢文又何嘗不然？現在許多受了西方語言學影響的人往往把漢文叫做漢語，因為他們接受了一個前提——文字是語言的紀錄，但對中國文字和文言文的關係來說，這個前提還是值得商榷的。不錯，在尚書、詩經這些先秦文獻裏面，確實保留了许多當時的口語語匯；但同樣不可忽略的是：這些典籍裏的絕大部份詞匯雖然都是從當時的口語中提煉出來的，但已經不再是口語的原貌，尤其在詞法和句法上，和口語的表述方式有很大不同。時下流行的文學史家認為我們的老祖宗們當日說話本來就是如此，這點我是不敢苟同的。從古人的口語到古人的書面語，是一個簡約化的過程，漢文就在這種簡約化的原則下發展著，歷兩漢、唐宋而成為一種典範的漢族共同書面語。我們必須注意這種典範的書面語在語法和詞匯上都跟我們的口語走著兩條分歧（但並不相背）的路，要學習這種書面語唯一的方法便是熟讀成誦，久之，我們的頭腦便產生一種功能：口語譯成書面語，使書面語包容更多的口語內容。這種“以簡馭繁”的表達方法，是由漢字基本上是意符文字所決定的。過去我們學文言文的老法子如此，今天我們要說粵語的香港兒童學習白話文，由於白話文的語法和詞匯和粵語也有很大差異，恐怕背誦的老法子還是扔不掉罷，何況古人所說文

章裏的“神理氣味”或是現代人所說的“韻味”“意境”等，如果我們不能成誦的話，恐怕是無法體會的。

如何補救目前中文教學的流弊

從根本上說，教學工作的改進，有賴於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的改革。目前香港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指導思想，有很多值得研究和探討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孤立地談改進教學是十分困難的。姑且提出幾點初步意見，供諸位參酌。

一、首先要編撰一套好的中文教材。目前小學的語文教材，水準很低。我們對此曾作了一些研究工作，發現相當數量的教材語言不規範，練習題繁瑣無聊，且有思想意識不健康的課文。教育當局理應組織人力重新編寫一套思想意識健康、內容充實、形式多樣、語言規範、程度適當的統一課本。中學教材雖有統一篇目，却無知地使文學和語文分家，把語文課變成語言課，而在選目、編排、數量等方面都存在不少問題。加以各出版商競相編寫輔助教材，致使教學要求、教學重點極不統一，而且內容繁複冗贅，形式五花八門，既不考慮量力性的原則，又嚴重脫離實際。教材是中文教學活動的重要媒介，不設法解決是不行的。

所謂好的教材，原則上應該是思想健康、內容充實、語言規範、體裁多樣、篇幅適當、可讀性強；文言文的篇目，也應佔一定的比重。

教材的改變和教學大綱的修訂是相應的。教育署應當作通盤的考慮。

二、採取有效的措施，培養大批“合格”的師資。“名師出高徒”，這是一句俗話，也是顛撲不破的真理。為人師表，既要有高尚的思想品德，又得有豐富的知識學養。對於中小學的中文教師，誰也不會提出博古通今、淹通中外的苛求，但具備基本的文學和語言的修養、能獨立地分析教材，有效地指導學生閱讀和寫作，最低限度，能熟悉教材所涉及到的各種知識、能引導學生閱讀和寫作，這些，總是應該具備的起碼條件罷！

爲了保證已經具備上述條件的中文教師，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成爲教學活動中的中堅力量，爲了使尚未具備上述條件的教師，有可能進修和提高，設法減輕目前教師過重的工作負荷是急不容緩的，勻出一定的時間，使他們在提高教學質量上多下工夫，是十分必要的。此外，加強教學研究和教學交流的活動、定期對教師的教學質量進行考覈，也是值得考慮的措施。

三、教學方法必須改變。教師在講課時，不出錯、不誤導，這指的是教學內容有科學性；進一步，要使學生易於接受，並且獲得實際的分析、品味、欣賞、鑑別文章的能力，這是教學方法的藝術性。從事教學活動的“名師”，不僅要善於把應該傳授的知識講出來，更重要的是：要善於把自己的知識和學問，化爲學生的知識和學問。不但要教學生讀書，更要教學生會讀書。不如此，就不可能“青出於藍而青於藍”。這中間就有一個教學方法問題。注入式和問答式，是無論如何達不到這種境界的，只能採取啓發式。

究竟怎樣才算是啓發式，可能有種種不同的理解或誤解。我想引用幾句老教育家葉

聖陶先生的話：

教師要朝着促使學生“反三”這個標的精要地“講”，務必啓發學生的能動性，引導他們盡可能自己去探索。傾筐倒篋容易，畫龍點睛艱難。

“傾筐倒篋”是注入式；“畫龍點睛”，誘導學生思維活動的“能動性”，進而能“舉一反三”，是啓發式。依照這樣的認識，可以派生出許許多多具體的教學方法，而且不必人人相同。還要注意一點，就是啓發式要在全部教學活動中貫徹始終，即從預習開始直至一課書的結束，都要力爭採取啓發式。教師在備課時，除了思考教學內容，還要設計相應的具有啓發性的教學方法。

我想，這是中文教師必須重視和研究的新課題。

四、加強課外閱讀的指導。在通常的情況下，學生對某種學科產生興趣，總是和教材編寫得好，教師教學得法密不可分（當然也有受家庭或社會影響而喜好某種學科的）。如果中文科的教材、教師、教法都解決得比較好，學生的學習主動性和積極性肯定會大為提高。這時，不僅鞏固了課堂教學的陣地，而且學生會如饑似渴地尋找課外讀物。這就產生了一個如何指導的問題。指導學生閱讀課外讀物，培養學生閱讀課外讀物的興趣和習慣，是中文教學的極為重要的輔助活動，也是中文教師責無旁貸的份內之事。這可能也是一個新課題，有待中文老師好好研究。但我覺得，應該把閱讀優秀的現代文學作品作為重點。可以每學期指定一批課外閱讀書目，由學生自由選定篇目，定期組織讀書心得交流會或專題演講。講者可以是教師，也可以是學生。老師講，是以身作則，對學生有極大的推動和促進作用；學生講，是樹立楷模，對其他同學也是一種鼓舞和激勵。如果閱讀課外讀物能在各所學校蔚然成風，其深遠的意義是多方面的，甚至是不可估量的。

以上講的四點意見，實行起來可能有種種困難和阻力。但是，面對香港中文教學的實際狀況，不痛下決心，堅韌不拔地衝破險阻，全力以赴地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那麼香港的語文教學，只能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在現有的軌道上因循地走下去。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和教學工作的收成期是不能以日月或季度來計算的。嚴峻的現實，不允許我們一再延誤“農時”。要有一批勇於承擔重任的有識之士，肩負起這副改革教育和改進教學的重擔。